

体认视角下的永川地名研究

邵子涵

(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市, 400031)

摘要: 行政区划及街道、居民区地名中包含着当地的民俗特点。而地名背后的文化色彩又体现出了该地域人民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认知倾向,从而塑造出了特色鲜明的地域形象。首先,地名是人类身体经验的产物。语言中的抽象概念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通过隐喻建构;其次,永川地名中包含了人们对自然人文地理、方言、观念愿望等方面的认知特色;再次,对于周边事物的体认早已深植于重庆人民的思想观念中,并在塑造城市面貌和现代实践中表现出来。

关键词: 体认语言学;永川地名;地域文化;城市面貌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体认语言学(ECL)由王寅于2014年提出,以“唯物论、人本观”区别于认知语言学(CL),是认知语言学本土化的结果。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个体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1]。地名作为一个地域的特指符号,在命名之时就概括了该地域人民的体认结果,包含着对自然地理、文化景观、宗教信仰、观念意愿等方面的认知,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永川区是重庆市辖区之一,地形以缓丘为多,山水纵横,五条山脉成“川”字形排列,形成了独特的自然风貌。本文依据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结果《四川省永川县地名录》,拟从体认视角出发,以期为地名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一、永川地名的自然景观体认

1.1 地形地貌在地名中的体现

周文德(2013)指出,重庆地名通名真实反映的地形地貌特征可概括为“山多水密,山川相连”^[2]。纵观永川区的3000余条行政区划及街道、居民区地名,重庆的自然特性色彩非常显著。大致可以按照“与山有关、与水有关”分为两大类。

1.1.1 与山有关的地名数量庞大

在永川的行政区划及街道、居民区地名中,“坝、坪、堡、垭、坡、坎、坊、坳、岭、峰、岗、山、冲”等与山地地势起伏密切相关的语素构成的地名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景观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有山就会相应地出现“山区和丘陵地区局部的平地、两山之间的狭窄地方、地形倾斜的地方、山间的平地”,而将这种现实存在的实体,通过视觉、通感等方式投射到抽象的概念(地名)中,并将其这种概括性的抽象概念作为某地的地理特征代名词的过程就是体认机制发生的证明。与“坝”相关的地名有碾子坝、颜家坝、稻场坝等;“坪”则有碾子坪、墨斗坪、豌豆坪等;“堡”有甑子堡、鱼洞堡、大松堡等;“垭”有三角垭、斩龙垭、凉风垭等;“坳”有碑岚坳、大岚坳、坳口等;“岭”有九岭岗、五岭、文家岭等。在地名册所录入的各级行政区划中,随机选取两个公社(双河公社、马银公社),对其地名中含有的与山有关的地名做统计,发现双河公社的41条地名中有11条符合条件,马银公社的24条地名中有9条。由此可见,该类地名的种类以及用此种命名方式的数量不容小觑。

从唯物论角度出发,有山则有石、岩、道拐等自然事物和现象,也就有了将其应用于地名中的意识。如,石庙子、石板田、石河沟、石岩湾、白岩槽、白家岩、九道拐等。其中仅

以“石”字作为开头语素的地名就有 134 条，由此可以推断，以“石”为语素的地名在永川地名总量中的占比非同小可。

在与地势有关的地名得名之由中，也不乏人们对形象、声音的体认（视觉、听觉的运用）。如，锣鼓山（山上有一石，形似锣鼓）、锣石坝（有一块石坝，形状像大锣）、莲花坝（此坝地形似莲花），类似的还有阳坪、金龙山、母猪山等；听觉体认如，打锣坡（过去守更打锣的地方）、鹅鸣山等。

1.1.2 与水有关的地名种类丰富

“江、河、溪、沙、凼、滩、坨、湾、流、沟、泉、潭、井”是“水”在地理中的表现方式，如陡石滩、龙潭沟、钟沟湾、烂泥沟、金银凼等。以莲花公社为例，在录入的 45 条有效地名里，符合条件的有 9 条；再以陈食公社为例，在所录入的 76 条有效地名里，符合条件的有 9 条。其中以“沙”开头的地名有 45 条，“河”31 条，“滩”5 条。由此可以推知，“水”及其变类在永川地名命名中有着重要地位。而在自然环境山水相间的永川，以描述自然地理特征的方式命名，正是现实投射至认知（有水便需进行区别，则有了江、河、溪、凼、潭、井等水的“变体”，这些地理要素又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随处可见的）再反映于语言的结果。

与水有关的地名体认还体现在“响、鸣、打锣”等语素上。响水桥，此山沟桥下常年流水有响声，故名；响水洞，此地一溪水流入洞中，常有响声，故名。

“**嘴”亦是基于体认的结果，如，羊角嘴、猴子嘴、母猪嘴、象鼻嘴等，皆因其形似该专名，故名。而“嘴”这一通名同样来自于体认，“嘴”是会意字，原指鸟的嘴，后引申为人的嘴，也即“凸出的地方。人类的认识基于对自身和空间进行互动的理解之上，沿着由近到远、由具体到抽象、由身体和空间到其他语义域的路径，通过互动逐步发展起来。而在身体感知的角度上，人类的主体性和体认的基础性无一不表示着人体部位的词语极易通过隐喻投射到其他语义中，如“山头、山腰、山脚”等^[3]，这也与古人曾说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相契合。国内以此命名的地区著名的如，上海陆家嘴、香港尖沙咀、天津梁家嘴，它们都可理解为“伸向海洋的形状尖尖的陆地”。该种命名方法不仅与形状相似有关，更体现出了“民以食为天”的观念。

1.2 动植物在地名中的体现

永川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是大量亚热带植物生长的佳地。梨是永川区的特色水果产业之一，尤以黄花梨为最。在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中，带有语素“梨”的地名有 14 条，梨子园、梨树湾、刺梨沟等。其他常见用字如，柑、麻柳、（斑）竹、黄桷、葛麻、李、桐、柏、杉、茅、林、桂花、梅、芭蕉等，以“黄桷”为首个语素的地名有 15 条，“斑竹”18 条，“皂角”4 条，“松”26 条，“柑子”9 条，“茅”5 条。相比之下，四川南充的地名中包含“黄桷”的地名仅有 7 条，“黄桷+通名”的数量之多不仅显示出黄桷树作为市树的当之无愧，同时也是永川人民对“市树”体认的佳证。

永川地名中常出现的动物有猫儿、鹰、龙、凤、鱼，“蛇”较少。其中，龙、凤更多地体现在民众的图腾崇拜，后文再进行探讨。“猫儿+通名”有 8 条，“老鹰+通名/白鹰+通名”10 条，包含语素“鱼”的 20 条，“蛇”字两条，“龙”约为 156 条，从侧面反映出永川人民多年来生产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由体认的抽象概念（人类心智的产物）体现身体经验—生存空间。

1.3 方位感在地名中的体现

囿于地形的限制，重庆人对与方位（东南西北）的体验并不强烈，这种体验同样表现在

地名中。以“东”为首的地名有20条,“西”6条,含有“东”字的有26条,“东、西”使用的频率呈现出一种不平衡性^[4],而这种不平衡性也正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方向的认知:东方为尊,西方为卑。相比之下,通过山东省民政区划地名公共服务系统检索,同等级行政单位的山东省青岛市含有“东”字的则有1444条。在《中国地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名索引》中,全国首字为“东”的地名有东胜、东阳、东山、东营、东莞、东北平原、东都、东方、东风、东峰、东岗、东关、东沟、东海、东河、东湖、东平、东胜、东亭等248条,以西为首的则有158条^[4],多出近100条。相似的表方位的字还有“阴、阳”,分别有2条和14条。

“上、下”是重庆地名的常用字,构成“~上/上~/下~”结构。在用“上”、“下”给地方命名时往往呈现出对称的现象,也就是说对处在一高一低位置上的地方就往往用

“上”、“下”来区别,上河坝-下河坝,上楼子-下楼子^[5]。以“上、中、下”为首的地名分别为16,14,24条。上、下是市民对重庆地形地貌的最直接感受,是基于身体经验建构的空间概念^[6],直观地展现出了一个立体、多层次的重庆(永川)形象。

二、永川地名的民俗文化体认

2.1 常见词汇结构和构词语素

永川地名的结构大致可分为两类:“专名+通名”型和“专名+通名+通名”型。“专名+通名”结构可再分为单纯词充当专名和合成词充当专名两种^[7],前者有

A. 单音词

岩垮,倒碑,长沟,高坎,中桥,高坡

B. 子尾词

凉亭子,碾子垮,碾子坪,楼子坡,水和子,龙滩子

C. 其他

观音桥,老鹰岩,枇杷坳,黄桷坡,菩提垮,青桐山等。

后者数量多,不再一一举例。

在“专名+通名+通名”结构中,存在通名转化为专名的现象^[7],例如,油坊巷、老井坡,糖坊坝,桐子堰塘,鱼洞堡,新塘垮,九道拐,李家槽坊院子,熊家沟大院子等。原通名指类功能消失的过程与人类生活实践中趋向于对显著事物的体验,相比之下忽略或减弱对小单位、小整体的聚焦相关联。

另外,反义词使用的不平衡现象同样能够彰显人类的体认倾向。“大、新、高”为首的地名分别为169条,94条,76条;反之,“小、旧、低”则分别为44条,0条,0条。反义义场中成对的词在应用时,语义范围、使用频率的不相等,展现出了永川人民尚大求新的心理^[5]。

“双”基于现实的家庭观念,在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中是安全的隐喻,以双为美的民俗心理在地名用字中有所体现,以“单、双”为首的地名分别有1条和60条。除地名用字外,单双的意识还体现在地名语音的双音节化上:若专名为双音节,在称说时则较少加上通名,如永川区-永川;而若专名是单音节的,在称说时一般不会省略通名^[8],如金堂,破院。

2.2 “处所名词+头/高头”

同普通话比较,词缀“头”、“高头”附在处所名词词根之后是重庆方言的重要特点之一。重庆方言中的“屋头”有“屋里头,屋里”之意;“城头”意为“城里”;“街高头”意为“街上”。陈瑶(2003)认为,“头”作为方位结构“里头”在语流中逐渐弱化脱落“里”字的可能性很小。文章用成都、贵阳话在读“里头”时的语调问题论证了“里”字实际包含

着上述现象中的“里”之义，反倒“头”才是意义基本虚化后的词缀，而语义虚化后的语音成分更容易弱化脱落^[9]。所以笔者将探索这种语用习惯之由的眼光放到体认视角上。

笔者通过“山东省民政区划公共服务系统”检索，以“济南市、村居社区”为限定条件，发现只有85条地名符合上述结构，且包括了“码头、抬头”等非处所名词+头的结构。笔者又在华北-东北方言区做了小范围的调查，发现无论是在方言还是在普通话中都几乎没有类似的表达，除了部分熟语（如，老婆孩子热炕头）。“头”字的本义是脑袋，指人身体最上的部分，引申为物体的顶端或末梢^[9]。笔者认为，这种表述方式来源于古时人们对“上城墙”的体验。城墙作为高处（空间概念），与人类的身体部位联系起来，成为了抽象概念的基础^[6]。中国的城市曾一度有城墙，当人们登上城墙时也即登上了城市这个空间序列的“头部”位置。

永川地名中符合该结构的有：

“石灶头，四合头，塘湾头，大沟头，田沟头，孔湾头，天堂头，槽头，谢湾头，湾头”等

综上，重庆地名中常用的“处所名词+头”的结构可以被看作是来源于对身体部位的体认。

2.3 “姓氏+家+通名”

在永川地名中，有很多以姓氏为专名的地名，结构通常表现为“姓氏+家+通名”。永川区行政区划及街道、居民区地名中涉及到的姓氏有151个，例如地名肖家冲、杨家坡、晏家塘、廖家店、蒋家湾、石家院子、徐家槽坊等。周文德（2015）提出，以家族姓氏命名地名，与明清时期的川渝移民有很大关系。在“插占为业”政策的影响下，移民来到新地方便以自己的家族命名插占之地^[11]。笔者认为，这种命名方式正是基于某家族在该地域开垦、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身体经验^[5]，继而有着浓厚的家族观念，从而进入现实-认知-语言^[12]的公式中。

2.4 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人们生活实践的产物。远古氏族社会时期，人们恐惧雷、电等自然现象，于是对自然界产生了一种敬畏的心理，将其奉为神灵，以求生存的安定^[7]。在古人心目中，“龙”能兴云雨、利万物，正与人们的心理需求相适应。在永川地名录中，含有“龙”字的地名多达156条，仅“龙”字为首的就52条，例如，龙头山、永龙小学、骑龙寺、骑龙穴、龙生堂、龙滩子。“凤”是与龙相对应的图腾，如凤凰沟、凤龙场、凤凰屋基“龙凤”的出现正是基于人类社会“男女”的现实依据，体现出阴阳调和，万物皆宁的美好愿望，传统观念中的“龙凤呈祥”正是该观念的例证。

三、结语

本文基于ECL和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四川省永川县地名录》，对两者的结合进行了简要论述。据此，我们认为，永川行政区划及街道、居民区地名中体现着人类根据身体经验、认知投射于语言生活而形成的结果。同时，《地名管理条例》中明确提出，不能随意变更地名的要求更是验证了“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协调自己的言行与他人、社会相一致的一生”的体认语言学理论^[13]。约定俗成的地名也就成为了共视、共识、共显、共为“4J境界”的代表。体认语言学与地名的结合，无疑会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使得语言学进入新时代的快车道。

参考文献

- [1] 王际桐. 王际桐地名论稿[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2] 周文德. 谈谈重庆市政区地名通名的山水特色[J]. 中国地名, 2013(10): 12-15.
- [3] 王寅. 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67-68.
- [4] 王东茜. 汉语地名的文化特征[D].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 [5] 李文莉. 论重庆涪陵地名的命名类型及文化意义[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3): 150-154.
- [6]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02): 82-89+160.
- [7] 陈萍, 邓红学, 周骥. 重庆地名的词汇特点论析[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9(12): 121-124.
- [8] 邓慧蓉. 从中国地名透视汉族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J]. 学术交流, 2003(12): 138-141.
- [9] 陈瑶. 汉语方言里的方位词“头”[J]. 方言, 2003(01): 88-92.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318.
- [11] 周文德. 重庆市政区地名用字考察[J]. 中国地名, 2015(12): 27-30.
- [12] 王寅. 体认语言学发凡[J]. 中国外语, 2019, 16(06): 18-25.
- [13] 王寅. 体认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4(02): 9-17+158.
- [14] 苗春华. 重庆方言的词缀“头”[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2(06): 44-46.
- [15] 王连勇. 论重庆都市地名的文化特色与城市形象[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03): 105-109.
- [16] 李锡梅. 江津方言词尾“头”和方位词“高”[J]. 方言, 1990(01): 62-65.

A Study on Geographical Names in Yongchuan County, Chongqing Municip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Shao Ziha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indicates that the geographical names of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streets and neighborhoods embody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locality, which further embody the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shaped by the local people in the long-term producing and living practices. With a view to further reveal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embodied in the geographical names and providing a new idea for place-name study, this paper, based on Embod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ECL), selects the geographical names in Yongchuan County, Chongqing Municipality as the corpus and analyses the language structure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Yongchuan geographical na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natural landscape and folklore culture.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firstly, geographical names are products of human body experience and the abstract concepts in geographical names are constructed through metaphor on the basis of the local people's life practice; secondly, the geographical names of Yongchuan embody the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 people's natural and human geography, dialects, concepts and visions; thirdly, the core principle "Reality-Cognition-Language" in ECL is embedded in the heart of Chongqing people and embodied in the urban landscape and modern practice.

Keywords: ECL; Geographical names in Yongchuan; Local culture;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Reality-Cognition-Language

